

史海探源

1619– 1928 年间巴达维亚华人社会的
民事审判程序初探

赵文红

(厦门大学 南洋研究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关键词] 巴达维亚; 华人社会; 公堂; 法律移植; 法律传统; 审判程序

[摘要] 根据《公案簿》案例, 分别对审前、审理和判决这三个阶段的审判程序进行了梳理。在 1619-1928 年间, 巴达维亚华人社会的民事审判是一个典型的移民社会法律移植的历史现象。具有相当自治权力的公堂, 负责华人社会的民事审判。公堂较为完整地将母国的法律移植到所在地, 并保持了母国的民事法律传统。

[中图分类号] D634.33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162(2007)03-0047-07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Civil Judicial Procedure of Chinese Society
in Batavia between 1619-1928

ZHAO Wen-hong

(Research Schoo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Key words: Batavia; overseas Chinese society; Gongtang; law transplantation; law traditions; civil judicial procedure

Abstract Based on the judicial cases of Gong An Bu (Records of Legal Cas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ivil judicial procedure of three phases: pretrial, trial and judgment in the Chinese society in Batavia. The civil judicial system in the Chinese society in Batavia from 1619 to 1928 is a special historical phenomenon of law transplantation in the immigration society. With autonomous power, Gongtang took charge of the civil justice of overseas Chinese. The China's civil law was almost transplanted to Batavia's Chinese society and the civil judicial tradition from China was sustained there.

1619 年, 荷兰刚开始经营巴达维亚时, 该地还不是很出名。侨居这里的华人约 400 人。荷兰拟将其建成经营东方的大本营而开始招揽华人华商后, 华人才在巴达维亚迅速增长。1629 年, 达到 2000 人, 1725 年增至 10000 人。^[1] 1740 年“红溪惨案”, 华人被荷兰

殖民者屠杀近万人。^[2] 但后来华人又迅速增加。1815 年, 巴达维亚及周围地区的华人就达 52394 人。^[3] 由于共同的文化传统、经济、心理等, 巴达维亚出现了华人社区。对于华人社会的管理, 荷兰殖民者实行“以华治华”的政策。他们任命华人首领, 对华人社会进行间接

[收稿日期] 2007-03-25; [修回日期] 2007-06-18

[作者简介] 赵文红 (1976-), 男,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中外关系史和明清历史文化。

统治。1619年，荷印总督燕·彼得逊·昆任命他的好友华人苏鸣岗为甲必丹，管理巴达维亚华人的事务。关于甲必丹的职责，在苏鸣岗的任命状中说得很清楚：“今因有华人四百名居于此地，在吾人保障下，故应委其一人为首领，以增强及维持法律与秩序。为此之故，已由华人方面公推一人名鸣岗者主之——现核准该鸣岗应委为华人之领袖，有权处理一切民事，并与吾人共策进行。”^[4]以“增强及维持法律与秩序”为目的，给予华人首领“处理一切民事”的权力，意味着给予华人领袖一定的法律权力。这是巴达维亚华人社会民事审判权力的来源。此后，华人社会除了刑事和重大经济案件需提交荷兰当局审理外，其余都由华人公堂自行解决。“一九二八年（荷印政府）参议会通过一项新的法律，废除华侨华人头人的管辖权。”^[5]华人的民事自治才告解体，民事审判权利也才消失。

华人社会的民事审判从其权限来讲，是属初级审判。不过，荷兰很少干涉华人社会的民事裁决，实际上它又具有一般初级审判没有的裁决权。巴达维亚华人社会的民事审判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619年至1740年为初步形成期。这一时期，华人的民事审判有了专设法庭；华人公堂基本主干人员逐渐增加、齐备——以甲必丹为首，另有两位雷珍兰，一位武直迷、一个达氏。1740年至19世纪初期为完善期。这期间，华人公堂进一步正规化，同时重要的变化还在于公堂不再由“录事”负责记录而有了专门负责记录的书记官（朱葛礁），这是审判进一步完备的标志。^[6]19世纪初期到1928年为维持期，主要是秉承维持第二个时期的制度。华人社会的民事审判程序，可以较为明晰地分为三个阶段。其间虽然也有一个相应的发展完善过程，但前后变化并不是很大。因此，下文拟根据《公案簿》案例对各个阶段的审理程序作初步探索。

在讨论巴达维亚华人社会的民事审理程序之前，有必要对审判中涉及的几个重要要素作一概括说：（一）当事人。在巴达维亚的华人社会，社会阶层的划分不明显，所以巴达维亚华

人的法律地位相对平等。不管是荷印政府任命的华人妈腰、甲必丹、雷珍兰、朱葛礁等人员，还是普通的平民，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都有当事人能力——诉讼的权利能力、诉讼上权利义务主体的资格。值得一提的是，在各种案件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妇女的身影，这点与清代妇女的诉讼能力受到限制有很大差异。清代，“若妇人，除谋反、叛逆、子孙不孝，或己身及同居之内为人盗诈、侵夺财产及杀伤之类，听告，余并不得告。以其罪得收赎，恐故意诬告害人。官司受而为理者，答五十。原词立案不行”。禁止的理由是“恐故意诬告害人”。^[7]在巴达维亚，从档案反映的情况看，妇女的法律权利与男性没有差别，各类案件中，都有妇女的出现。但不是说所有人的法律地位都是平等的。在《公案簿》中，就有关仆人的记载，有死或受伤害而没有见告于“公堂”的。最为典型的是1878年11月21日“王邻观叫钟来观”，这次的案件是由于王邻观在猫厘买得一男仆，被船主钟来推入海中身亡，王邻观告的是“奔波千里之血本，一旦沉没”，“伏乞究治”。^[8]人命关天，主人告的是以经济案件提起诉讼。从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仆人的地位。死否，并无关主人。主人也不会过问。同时，妇女的案件，明显在案件用词上还是尽量维持男性的权利。中国古代对妇女的歧视在巴达维亚的民事审判中，虽不是很明显，但也还有保留。（二）回避。案件主要的审理人员是轮值的雷珍兰，妈腰、甲必丹也参与，但不在多数，只有遇重大案件时才必需参加。案件也有涉及荷印政府任命的以上相关华人“官员”，“公堂”如一般案件照样受理，只是有涉案的人，不再参与审案。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出华人公堂审案中存在回避。（三）证据。公堂审案时，重人证。证人到堂，审案人员进行盘问。证人有荷兰任命的华人“官员”、平民、普通妇女、女婢等。同时，也重物证。合同、账册、赃物等都可作为物证。尤其是经济案件中，账册尤为重要，许多经济纠纷，都以此作为依据。案件审理中，如果没有物证，也没有人证，华人“官员”是不予判定的。

一、审前程序

(一) 受理

“公堂”是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二合一的华人民事处理机构。它在其职责范围内受理各种华人中的民事案件。从《公案簿》记载的案件看，主要有以下四种受理事由的形式。

第一种是直接由当事人原告控告而受理。在华民事诉讼中有以下种称呼：叫、入禀叫、控、入禀帖控（入禀控、入呈控）。“叫”多是口头控告。这是一种不是十分严格的控诉方式。入禀叫、控、入禀帖控、入禀控、入呈控，则是有书面的案情呈述的控告方式（“控”中不排除有口头控告的情况），比“叫”更为正式。在巴达维亚华人的民事诉讼中绝大部分是“叫”。1787年10月31日至1791年2月8日《公案簿》的记载中，没有后面几种控告的方式。其余几种在后来的《公案簿》中也较少。就现已出版的《公案簿》档案，1825年1月21日“陈光艺入禀叫叶尺”是“入禀叫”^[9]；1824年7月2日“故抚直迷李渊泉之妻邱谓娘控伊子李经文”是“控”^[10]；1824年6月25日公堂所审的第一件案子“李宗元入禀帖控陈四海”是“入禀帖控”的形式^[11]；1827年5月4日“李文旭入禀控李庚三”是“入禀控”^[12]；1827年3月23日“吴开二入呈控黄乔四”是“入呈控”^[13]。以口头进行诉讼为多，可能的原因是：巴达维亚华人汉语水平的限制；受中国民间解决纠纷多以非书面形式的习惯影响；公堂不是专门的法庭，是行政和司法的混合体。

第二种是第三人的告发而受理。这是非当事人就别人的事情提起的诉讼，就是我们平时通俗的说法——告发。如1826年7月20日“观音亭默氏郭大为李凤娘与江龙纠纷，请知公堂”^[14]，就是由郭大发告发而出现的诉讼。

第三种是移送。由荷印当局发现后移送公堂审理有关案件。这类案件不是很多。主要从以下几种途径移送。一是从荷兰东印度公司官员或殖民政府官员移来。如1787年11月14日《回复王上为陈国使事存底》就说：“蔡敦

奉上谕，查陈国使之事，敦同列位雷珍兰召陈国使母子对讯，并查其账簿……陈国使尚侵用陈富老之钱七百七十九文一铢一方。谨此连原词复禀上裁。”^[15]就是奉荷印东印度公司总督之令而审理的案件。1824年7月9日“奉挨实连（荷兰省长或副省长）命，藉责为冒名逃走的客商提供出水字的郑远、蓝天佑”。^[16]二是荷兰管理巴达维亚城内外事务官员的移送案件。如1825年5月27日“承内澹（管理城内事务的长官）命查复雅甘媚控伊外孙女黄玉娘逃走一案”。^[17]1789年7月1日“奉外澹（管理城外事务的长官）之命，委在甲大（甲必丹蔡敦官）府中查郭借、严艳交加账目”。^[18]1789年1月7日《藉责林待哥、陈汉代存案》“公勃沙里（Commissaris，专员、管理城外事务的长官）寄来和兰（荷兰）字一张内云：‘有二唐人，不知其姓名，寓住务兀墟，无禀公勃龙（Commandant，军队的司令官）知情，擅专相率私往芝安卒拐带妇人，回来被捉之时，诈言往彼处讨钱。……诈言塞责是实。兹交甲必丹大惩戒，嗣后勿使再往务兀居住。是嘱。’公堂接此字，即召问二人姓名，一曰林待哥，一曰陈汉代。问毕，谕其罪衍，不许再往务兀，命达氏（Soldaat，荷兰语，兵卒、公堂差役）藉责儆戒。”^[19]1826年11月10日“奉山顶大澹（管理城外事务的荷印官员）命，委查结石詹谢愿（又名大）控伊妻林仁娘逃走一案”。^[20]三是从荷印东印度公司司法官、殖民地方法院移来。1790年3月17日，“实奎炳（Scheper，巴达维亚市政府评政院委员，掌管司法，即荷印东印度公司的司法官）列上台委查黄达账簿与王珠娘交结钱项”。^[21]这就是从荷印东印度公司司法官员移来的案件。1824年7月2日“奉兰值力（荷兰语 Landraad 的对音，又作兰直力、兰得力、兰得律，地方一级的法院，从1824年起设立）命，委查柯文章诗礁（马来语 Sita 的对音，又作施礁，起诉或传票某人之意）李癸发一案”^[22]则从地方法院而来。四是从检察官移来的案件。1824年6月28日“承副美色葛（荷兰语 Fiscaal，马来语 Fiskal，即主管税收的检察官，他们以起诉的方式收税，分山、海两种美色葛）移会，为

闺女沈桂娘同朱秀娘、林春娘三人逃走一案”^[23]，就是荷印的检察官移来的。检查官有大美色葛、副美色葛，前为正职，后为副职。五是荷印公司或政府的下属机构移来。1788年1月9日“承唐人美色甘（又作美惜甘，Weeskamer，荷兰语，救济院）委查王祖（观）账簿与卢科交关（闽南语，交易）虚实何如”^[24]，此案就是由救济院移来的案件。

第四种是公堂“官员”查知后而受理。就是公堂的理事会成员有妈腰、甲必丹、雷珍兰、朱葛礁、武（抚）直迷、达氏、土公、区长等发现后而提起的案件。如1826年1月27日“抚直迷陈玉郎官为林谓成‘目无尊长。乱言放肆，伤犯甲必丹’”。^[25]就是公堂“官员”提出审理的案件。

以上各种控诉一般先将案情报告受理人（或妈腰或甲必丹或雷珍兰等公堂人员之一，有到妈腰或甲必丹私邸的，也有到公堂的），或将书面诉状送到受理人手中，就表示公堂予以受理。尔后，就等待规定的日子开庭审理。在控告中很少见不受理的，但也不是没有。如1787年12月19日“李阿七叫温端寿”，“列台因会钱之事，公堂不理”。^[26]

就原告和被告的人数情况，有一人控告一人或两人及多人，或两人及多人控告一人或两人及多人等的情况。原告有荷兰任命的妈腰、甲必丹等华人首领（如1847年10月7日“陈永元妈腰控梅花”^[27]），普通的在巴华人（男女皆有），中国来的华人（如1824年7月23日广东江门的船主黄绰控诉诸人一案^[28]），其他国家的人（如1825年7月22日“暹船主叫郑莱”^[29]，是暹罗国人控告的）。被告有荷兰任命的头人（如1825年4月15日“谢掌、徐炳、江东、张三、郭葱、谢朱星等同叫王甲奉官”^[30]，告甲必丹），普通的在巴华人（男女皆有），女婢（如1827年5月25日“张对生叫岳母并女婢桂花”^[31]）。公堂处理的主要是华人内部的纠纷案件。只有个别案件涉及外国人或土著居民。

（二）传唤

公堂受理后，第二个步骤是传唤当事人双方或证人于开庭时间到堂，开堂审理。公堂是

如何传唤当事人双方，是口头或是书面形式，没有明确的文献。因为公堂的案件多数是普通的经济或婚姻案件，一般是通过原告或公堂差役通知原告或被告或证人，或原被告其中一方约请证人，或公堂传唤有关证人。如1789年3月4日“叶沃观叫陈全观”一案，就是陈全观“前期（1789年3月4日）约唤盛祖到堂证实，奈寻他不遇。乞再限，后期唤其到堂奉审。”^[32]在《公案簿》档案中出现与传唤内容的词主要是“召”、“吊”二字。从“召”字来看，口头通知可能是主要的传唤形式。“吊”是公堂派出差役如达氏去通知相关人员，因此直接派差役通知是传唤的另一种形式。如1789年1月14日，审理“钟俊秀叫张洪伯”中就有“甲台着达氏吊到，赖景宁供谓……”。^[33]这是派人直接传唤来的。

（三）判决前的监禁（羁押）

巴达维亚华人社会的民事审判中，有判决前先将当事人监禁的情况。但这种事例不是很多。公堂没有羁押地，一般是在内外澹的囚所。1788年1月5日“高香观、蔡治观、江套观叫高桃观”一案，“甲大（甲必丹蔡敦官）恐事情未真，命达氏将高桃寄在外澹囚内且禁，后期再审”。^[34]1789年3月11日“叶沃观叫陈全观”一案，陈全观未到，后知道他在外打架，“列台命达氏沃见外澹，道知情由，可将陈全囚禁”。^[35]以上两件就是判决前的监禁事例。

二、审理程序

（一）审讯日期

公堂的某一段时间，审理案件的时间在星期几相对固定。如1787年10月31日至1791年2月8日，案件的审理基本都是在星期三，偶有星期五。当然，公堂不是每星期都开堂审案，或间隔一周或两周或更多。

（二）审讯处所

1619年，荷印总督燕·彼得逊·昆任命他的好友华人苏鸣岗为甲必丹。苏鸣岗没有办公的地点，1620年“乃求公班衙地一所居住，彼得逊即送望加赖（Mangga Doea）园地以为甲大之府，前挂大灯，书‘开国元勋’”。^[36]私人

房邸作为公署。甲必丹的私邸既是议事地点，也是审案的地方。此后，继任的甲必丹也是以自己的府邸作为办公的地点。至于公署内是否就有法庭的专设尚不知道。但1649年时，已设有专门的法庭。“颜二雅为甲必丹大往密查劳（Bichara）厅（云樵按：即法庭），如男人行仪，公庭断事，亦颇明决，可谓番妇中之杰。”^[37]密查劳是马来语，即Bichara，是议事、审判的意思。密查劳厅指法庭，就是甲必丹用来审理华人案件的地方。1690年，郭郡观为甲必丹时，“盖筑美色甘病厝，义学，美色甘密查劳厅（杨本有注云：‘名曰公馆’）”。^[38]此后，华人社会的法庭进一步发展。当然，公馆也不只是作为法庭，还是华人社会事务的议事场所。1742—1747年，甲必丹林明光在巴达维亚的城北建立“公堂”。1861年与1893年公堂悬挂的木刻碑记：“公堂者，所以奉公勤民，凡有利于公者，无不咨而谋之，举而措之，以笃庆壬林也”。“公者平也，平公察理；堂者同也，同堂论事。情有真伪，事有是非，非经公堂察论，曷以表其准！”^[39]1809年，甲必丹陈炳郎，在城南有自己的公馆，因此日常办公点又移到他的家中。只有新春佳节、任命新职等大典、处理重大案件时才到城北公堂。19世纪20年代，高长宗任甲必丹时。他在城南闹市中港仔（Jl. Tongkangan）建立高家公馆。为公私两兼，妈腰、甲必丹多在各自的家里办公。中港仔公馆，系高家私宅。1861年，妈腰陈永元等人在荷印政府的批准下，购买了高家公馆，所有公事才在此处理。^[40]

从上可见，案件的审理地点一般有两种：一是在公堂；一是在妈腰或甲必丹私邸。二者同存的时候，至于在哪里审案没有具体的规定，估计主要由负责人甲必丹（或妈腰）的意愿而定。

（三）审理案件的基本原则

在开庭时，如果原被告其中一方（或双方）未到庭，不予受理。未到一方（或双方），如果没有正当理由，以藐视公堂论。同时，要将未到庭一方（或双方）的原因记载在案。等下一期，待双方都到庭时方予以审理。如果双方在开庭前自行达成协议和解，那么此案也就

不再成立。

从《公案簿》档案看，审理采用的主要形式是双方对质、质问。双方陈述缘由后，审理人员对原被告双方进行讯问。案件审理中，原被告自行举证是较为常见的。如涉及经济的案件，原被告可以将账册、合同等物证提请审理人员检查核实。关于检查，有由公堂人员直接检查的，如账册的数目多，则由原被告自行核对后，将有关的结果提请公堂审理人员定夺。

（四）审理次数

案件的审理次数，一般一次就已事实明确的，审理人员一次就予以结案。但如果事实不清，还需进一步求证证人或提供物证等，要继续再审。在1787年10月31日至1791年2月8日中，共有664案次。其中一次结案的511次，另153案次有一案办理两次、三次等，最多的达七次之多。^[41]判决是由审理人员合议后作出最后判决。

三、判决程序

（一）判决之依据

公堂审理人员的判案依据主要是华人的习惯法。如《公案簿》就提及“唐人祖家常例”，“照依唐人礼法如何”^[42]。1788年8月27日“蓝东观叫蓝铨观”案，“列台因削视杨教不到，谕蓝铨曰：‘既无削视，是非难辨，汝是侄辈，当向汝叔服罪。’蓝铨当堂拜跪伊叔，叩头服罪。”^[43]这是十分明显的按中国传统来判决的案例。同时，公堂也制定自己的规则，这些也是惩处的依据。但从《公案簿》有关的案件档案中来看，当时华人公堂已受到荷兰司法的影响。1824年10月29日，陈敏娘入禀帖控伊夫林三牙，“列太会议判曰：‘……三牙胆敢目无尊长，狂言逆命，大干国法，律理难容。……’”^[44]这里的“国法”指的就是荷兰法律。因其后又提及“合应请知挨实连案夺戒责，以儆后来”。^[45]所以判决的依据也有荷兰的法律。

（二）判决、记录结案

关于案件的判决，一般由审理人员在事实清楚的情况下，会议后作出判定。大多当堂判决。从案件的档案中“谕……”来看，很多都

是口头的判决。但每一个都由记录人员记录在案,即使再有要控、要求执行判决,前面的判决就是依据,查前所判即可。其判决的法律效力没有削弱。部分还要双方按手印予以确认。

此外,还有以下判罚。一是神判。事实不清,双方争执不休的情况下采用神判。过去人们认为神明可以洞知善恶和真伪,故而通过双方盟誓的办法解决纠纷。这种判罚在中国东南沿海民间常用于解决纠纷和争议。在巴达维亚的档案中,通过神判的例子还占有一定的比例。如1787年至1791年的639案次中,就有59案次45案,是通过神判解决的。“占总案次639案次的10.83%。”^[46]盟誓的地点有观音亭、寺院等。二是拈阄。这是一种机会均等的判罚方法。在巴达维亚公堂的判罚中有采用此法的。1788年1月9日“李金娘叫阮寿娘”,关于谁可以拥有出租房就是通过拈阄决定的。^[47]

(三) 提请荷印司法部门裁决、移交荷印司法部门

有一小部分案件,审理后公堂要将拟判决提请荷印司法部门的裁决。如1789年9月23日“邹偕观叫高再观、许三结”案,“甲台谕曰:‘前日既已投澹,可就澹察夺’”^[48],就是移交荷印相关部门察夺的案件。

公堂移交荷印司法部门的案件,一是不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的,如重大经济案件、杀人案、盗案等。如1788年4月16日“严四哥、洪熔化、江占观、吕元观、黄编观、黄八哥、叶逢观、钟满观,同叫赖宴观、黄连生”案,经济数额大,“列台谕二比曰:‘此事不敢理问,可到上人台前定夺。’”^[49]也有不是很重大的,公堂嫌烦不予受理的情况。在档案中有一些小案件也要求到荷印司法部门审理的。二是双方没法说服。1788年1月9日“谢昌盛叫李宁义”一案,“列台因二比不能相让,又不听劝谕”,就“命达氏押往内澹处察夺”。^[50]三是公堂已审理过、判决,双方又提起诉讼,公堂不再理,而要求到荷印司法部门进行诉讼。如1788年10月29日“郑祥观叫朱温观”案,“公堂为前期四月廿三日(1788年5月21日)经一案断,着往密查劳厝顶,兹不得再

读。”^[51]四是当事人一方不服,要提请上诉的,必须到荷印司法部门。如1788年8月20日“杨插老叫蔡永观”案,公堂判决后,“杨插甘愿。蔡永不愿。列台谕往密查劳厝顶投告”。^[52]

综上所述,在1619—1928年间,巴达维亚华人社会的民事审判是一个典型的移民社会法律移植的历史现象。从中国到巴达维亚的华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了华人社会,并在荷属东印度公司或荷印殖民政府的授予下,华人社会具有相当自治权力的公堂,具有相当的民事审判权。公堂较为完整地将母国的法律移植到所在地,并较好地保持了母国的民事法律传统。尽管随着荷印政府对华人社会法律控制的逐渐加强,尤其是从18世纪中后期华人社会的民事审判也有西方法律影响的痕迹,但华人公堂的民事审判程序较为系统,整体变化不大。直至荷兰殖民政府取消华人领袖的管理权力,华人社会相对独立民事审判权利的历史也才成为过去。

[注释]

- [1] [英] W. J. 凯特著,王云翔、蔡寿康等译:《荷属东印度华人的经济地位》,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2页。
- [2] 费缪伦著、李平等译:《红溪惨案本末》,雅加达:翡翠文化基金会,1961年,第65页。
- [3] 温广益、蔡仁龙、刘爱华、骆明卿:《印度尼西亚华侨史》,海洋出版社,1985年,第94页。
- [4] [6] [36] [37] [38] 许云樵校注:《开吧历代史记》,载《南洋学报》第九卷,第一辑,1953年6月。
- [5] [英] 布塞尔:《东南亚的中国人》,卷七,载《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58年第2—3期。
- [7] [清] 沈之奇撰,怀效锋、李俊点校:《大清律辑注》,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839页。
- [8] [15] [荷] 包乐史、[中] 吴凤斌校注:《公案簿》(第一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页。
- [9] [10] [11] [12] [13] [14] [16] [17] 袁冰凌、[法] 苏尔梦校注:《公案簿》(第二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52、11、2、396、382、330、19、205页。
- [18] [19] [荷] 包乐史、[中] 吴凤斌校注:《公案

- 簿》(第一辑),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第 178、110 页。
- [20] 袁冰凌、[法] 苏尔梦校注:《公案簿》(第二辑),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第 363 页。
- [21] [荷] 包乐史、[中] 吴凤斌校注:《公案簿》(第一辑),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第 255 页。
- [22] [23] 袁冰凌、[法] 苏尔梦校注:《公案簿》(第二辑),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第 10、4 页。
- [24] [26] [荷] 包乐史、[中] 吴凤斌校注:《公案簿》(第一辑),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第 17、13 页。
- [25] 袁冰凌、[法] 苏尔梦校注:《公案簿》(第二辑),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第 289 页。
- [27] [中] 吴凤斌、[荷] 陈萌红、[荷] 包乐史、[中] 聂德宁校注:《公案簿》(第五辑),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第 215 页。
- [28] [29] [30] [31] 袁冰凌、[法] 苏尔梦校注:《公案簿》(第二辑),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第 31-33、224、184、405 页。
- [32] [35] [荷] 包乐史、[中] 吴凤斌校注:《公案簿》(第一辑),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第 123 页。
- [33] [34] [荷] 包乐史、[中] 吴凤斌校注:《公案簿》(第一辑),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第 112、16 页。
- [39] 转引自 [荷] 包乐史、[中] 吴凤斌著:《吧城公馆档案研究: 18 世纪末吧达维亚唐人社会》,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第 3 页。
- [40] 袁冰凌:《吧城公馆档案与华人社会(代序)》, 载袁冰凌、[法] 苏尔梦校注:《公案簿》(第二辑),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第 3-4 页。
- [41] [荷] 包乐史、[中] 吴凤斌校注:《公案簿·前言》(第一辑),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第 3 页。
- [42] [43] [荷] 包乐史、[中] 吴凤斌校注:《公案簿》(第一辑),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第 11、77 页。
- [44] [45] 袁冰凌、[法] 苏尔梦校注:《公案簿》(第二辑),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第 108 页。
- [46] [荷] 包乐史、[中] 吴凤斌著:《吧城公馆档案研究: 18 世纪末吧达维亚唐人社会》,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第 26 页。
- [47] [48] [49] [50] [51] [52] [荷] 包乐史、[中] 吴凤斌校注:《公案簿》(第一辑),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第 19、212-213、41、20、86-87、74 页。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詹森教授在北京作学术讲座

应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邀请, 2007 年 5 月 27-31 日,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UBC) 人类学与社会学系教授詹森 (Graham Johnson) 博士到北京访问, 为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北京外国语大学及清华大学的师生作了三场学术讲座并进行了交流。

在清华大学, 詹森教授作了“侨乡移民港口与北美的联系: 跨越三个世纪的变迁——以广东台山端芬为例”的演讲。演讲中, 詹森教授探讨了侨乡的变迁以及侨乡的海外联系如何既有助于而又阻碍侨乡的发展。此外, 詹森教授还探讨了连接端芬、台山、广州和温哥华的建筑学环境。演讲由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龙登高主持。来自中国科学院、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的学者以及清华大学的部分研究生参加了座谈。在北京外国语大学, 詹森教授作了“从加拿大华人看加拿大的多元文化”的讲座。来自北外加拿大研究中心、加拿大俱乐部、英语学院等院系的师生共 20 余人聆听了詹森教授的讲座并相互进行了交流。另外, 来自澳大利亚的访问学者安·安琪儿 (Ann Angles) 博士也参加了讨论。在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詹森教授与该所加拿大研究中心的学者围绕“加拿大移民和华人研究”进行了座谈。参加座谈的有该所加拿大研究中心副主任、博士生导师周庆生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海外华人研究中心秘书长曾少聪教授以及民族所加拿大研究中心的姜德顺、石茂明、赛、张小敏、高建平、杜发春等人。詹森教授在北京访问期间,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副局长张友云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庄孔韶教授分别会见并宴请了詹森博士。(杜发春)